

下一季，登场的不知道又是谁

唐吟方

种反应。

“今天我的朋友圈被一个叫黄宾虹的老头儿刷屏了，因为他的画卖了三个多亿。这账叫《黄山汤口》的画，可以在北京二环边上换两套房子。”

“一间孤单的危房，二个衣衫褴褛的闲人，三四个断续的溪口，五六丛成林的枯树、七八点迷濛的峦影，十数重密集的乱山……三亿元!”

“当代夜场门可罗雀,近代夜场热情四射……”

无论是调侃还是心情演绎，作为普通人，任何一个切入点都可能转换成他们面对现实生活情景的关联性表达。

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，等了50年之久才换回3.45亿。这大概也是朋友圈中有人要刻意夸张黄宾虹生前的“落魄”和被“冷遇”，用反差来烘托黄宾虹迟到“成功”的原因。

黄宾虹的真实历史，未必像今天“朋友圈”说的那样“落魄”。在那个年代，他是数一数二的艺术界名流，曾担任故宫古物鉴定委员，北平艺专、国立杭州艺专的教授，1930年代就是资深的全国美展的审查委员，还是民国体量最大的《美术丛书》的策划者、主持人，其“复兴中国现代艺术的贡献”被蔡元培称赞……一部民国美术史，重要的节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

和当下情形不一样，民国时期并不把卖画生意和评价画家好坏混为一谈。傅雷在1940年代后期就预见性指出过黄宾虹的意义。他在比较了同时代及年代稍前的画家后，得出了黄宾虹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画家的判断。后来主持华东美术界工作的赖少其也折服于黄宾虹绘画的博大精深，还有像余绍宋那样的人物，也给黄宾虹极高的评价。曾经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学者马衡，倒是用“落魄画家”称呼过黄宾虹，同样也差评过齐白石。

这样说，无非是想说明“卖画的行情”和“好画家”是两个概念，生活拮据与画家精神到达的状态也不是一回事。

黄宾虹的不得时好与在美术史上的意义是两个问题。今天的艺术市场，模糊了这些问题，也聚拢这些品质，最后以一个大家都看得懂的方式呈现。它聚焦的价值，既有同体系不同作品的价值比较，又由作品指向一个明确的货币数字，让黄宾虹的价值提升到一个可以置于当代经济体中进行评价的位置。

黄宾虹讲究内美，和中国绘画史上那些注重自我宣传的画家相比，他显出不修边幅的低调，这和他的画有点相像，没有普通人一下子看得懂的美——黄宾虹追求的美显得古典深邃，金石气十足。

《黄山汤口》的3.45亿成交额，有人理解为对当代黄宾虹审美的认同。但换一种角度，黄宾虹只是在21世纪审美转换中获得了—个暂时领先的机会。与其说是他的成功，不如说是美术史的成功。美术史家们几十年的无数次选择，尽管无法改变人们的喜好，但对当代黄宾虹价值的确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当然，这也取决于黄宾虹的艺术史观、艺术追求与作品内在品质。艺术史和我们经历的历史一样，总有上上下下几个层面，翻滚的历史有自我修正的能力，艺术史也不例外。或许这还可看成是艺术史的“公道自在人心”。

今天的艺术市场远不是买和卖那么简单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这是经济与艺术关系中最敏感最复杂也是牵涉面最广泛的地带，牵连者社会多个层面——政教和金融，政策和货币,还有业界的走向，社会背景的一丁点涟漪都会掀起艺术市场的波涛。多少表演演绎出风风雨雨的悲喜故事，有艺术的想象空间、有资本的膨胀和业界的光荣与梦想。

黄宾虹给艺术市场投下的一道虹影，无疑给走向不确定的市场注入了活力。不过，今天领秀的黄宾虹，他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影响下一季的样板，或许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回答。

遗憾的是，黄宾虹的《黄山汤口》只有一件。

2017年6月26日北京蓝旗营小区

去年生日的那个周末，女儿请我到郊区的一家农家乐吃生日饭。点的都是刚出土或出水的蔬菜、水鲜，只只菜鲜美可口，尤其那盘炒嫩菱脆而甜，令人胃口大开。不由勾起了我少年时采野菱的回忆。

采菱，古已有之。我国早期文献《礼记》《楚辞》就有采菱的记载。元朝诗人王恽作有《平湖乐》云“采菱人语隔秋烟，波静如横练……”。西晋的张协，唐朝的刘禹锡，宋代的欧阳修等都留下不少有关采菱的佳诗名句。

野菱因状如狗头，又俗称“狗头菱”，是一年生水生植物，属于菱的一种。二、三月萌芽生叶，渐成菱盘，夏末秋初开花结果，九、十月可采摘。

一个甲子前，我十二三岁起就爱采野菱。我爱采野菱，是因野菱肉质细腻，口感香脆而无淀粉味，好吃，是菱中上品；是因凡湖塘普遍长野菱，源头丰富，取之不竭。

采菱季节，每逢节假日，我吃完早饭，就肩扛湖船直奔事先观察好的池塘。湖船是采菱的主要工具，是个直径约1米左右、内层深约30公分的水盆。既是交通工具，又是盛具。采菱者在湖面上移动、采摘和盛菱都有赖于它的忠实服务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所以采菱必须先学会划船。

起初，我因不谙船性，那船根本不听我的，让其向东，它偏往西；或原地打转，甚至故意前倾后翘，险象环生。我姐有一次采野菱时船闹别扭，船底朝

采野菱

朱林兴

天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
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“心之官则思”。为了迅速学会划船，我以浅水河塘作平台。边学划船，边揣摩人船湖三者之间关系，领悟其道：臀部坐在船心，下身静，上身微倾，保持船体平衡；双手作桨，生动力，定方向，调速度。掌握了“人船合一”的技巧后，那船好像是我双脚的延伸，犹如哪吒的风火轮，在湖面上驰骋，大有如履平地之感。

学会了划船，还不等于会采野菱。采野菱还要掌握避刺的技巧。野菱四角尖锐如针。第一次采菱，我不知道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着力点应放在野菱的哪个部位上，结果不但效率低，而且两指让菱角刺满了密密麻麻的眼子，肿痛了好几天。

由于野菱长在叶腋下，没入水中，为菱盘所覆盖。采菱必先将要菱盘提出水面。初，以为这很容易，只要用左手将菱盘抓出水面并仰天翻转，菱盘上有多少可采的菱便一目了然。谁知我按设想

摇曳多姿的字，矮矮胖胖的人

——赵景深先生旧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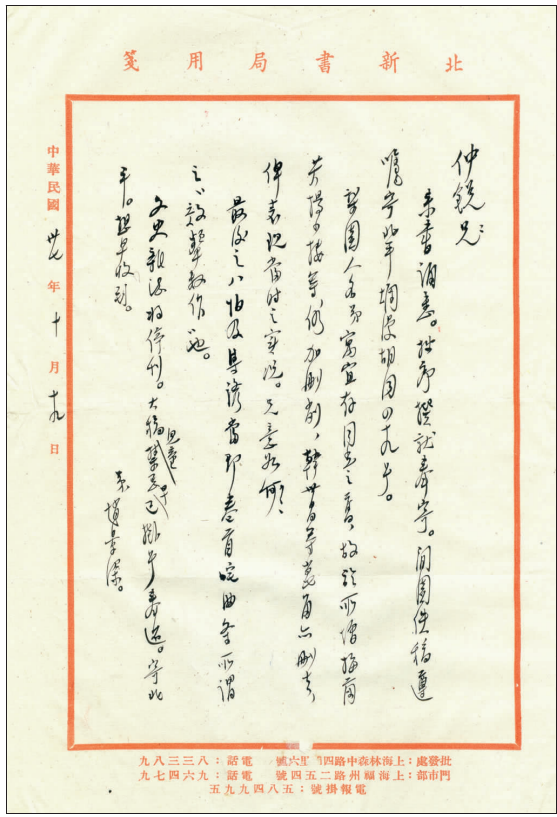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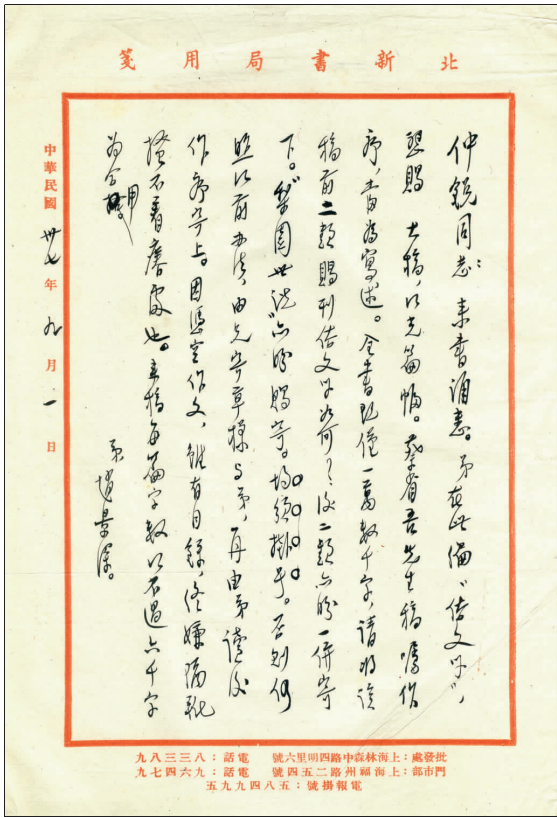
唐吉慧

天申奶奶在世时，有天把我叫去，让我帮着从拥挤的书橱里找一本《粟庐曲谱》，说曲社一位年轻的曲友想借去读一读。老太太向来古道热肠，曲社里曲友们的请求，她从没有不答应，包括写信为我向她的四阿姨张克和求字。不过这次略有些计较：这套曲谱她藏了多种版本，老的线装不好借，俞振飞签了名的不好借，自己做过修改的不好借，此三种外皆可。我翻出一本崭新的香港版递给她，问她如何。她拿在手里翻了两页，忽然皱皱眉头说，赵景深什么时候写了字了。我凑过去看，扉页上果然歪歪扭扭竖了两行字：“供天申曲友学习。赵景深赠。”“伊个字哪能写得嘎难看。”老太太蹦出这一句。

赵景深是昆曲迷，年轻时正儿八经跟昆曲传字辈的老先生学过戏，学唱学身段，一样不落，更为昆曲的传承和推广做了不少工作。天申奶

奶从小喜欢昆曲，是上海昆曲研习社的首批社员，介绍人正是赵景深，那会儿他们常在一起参加曲会唱曲子，所以对赵景深比较熟悉。老太太随即聊起赵景深一段趣事，说以前赵景深和俞振飞演《狮吼记·跪池》，赵先生演苏东坡，俞老饰陈季常。按剧情，苏东坡在被凶巴巴的柳氏骂了一通后，吓得逃到椅子后边去，没想赵景深近视眼，视线模糊，动作一着急，让椅子绊倒在了台上，台下以为赵先生演得认真生动，意外地来了个满堂彩。我之后在俞振飞年谱中找到关于这次演出的简单记载，时间在1943年11月19日，演柳氏的是传字辈名角朱传铭。

我告诉老太太，其实我看过几封赵景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友人的书信，与《粟庐曲谱》上的字一样，既小且丑，像一条条被挖出泥土的小蚯蚓在乱动弹，不仅“嘎难看”，而且难



筆會

赵景深致张仲锐信两通

“文汇报”
微信二维码

了船移动时留下的一条清晰的痕迹。几乎每次采菱，不用三个小时，就可满仓而归，足足有八斤，乃至十斤之多。当天晚上全家就围着小圆桌尽情品尝野菱美味，吃不完，第二天上街换钱，以买文具用品。

世界是个万花筒，无奇不有。我采野菱除了物质上的收获外，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当年，我常去采菱的池塘叫“小团浜”，此浜不大，菱叶覆盖浜面，秋风吹来阵阵清纯菱香，浜中央菱叶上坐有一只青蛙。湖面组合虽简单，然“菱池如镜净无波，白点花稀青角多”（白居易《看采菱》），和谐高雅。第一次去此浜，那青蛙远远见到我，未等我将船入水，早已逃之夭夭。其实，它并没有逃远，而是在偷偷窥探我。过了一周我去此浜，这次它见到我后没有逃。又过了些时日，还是这只青蛙见我后居然不但不逃，还对着我“呱呱”地叫几声，好像在说“欢迎！欢迎！”我很佩服这只青蛙的灵性。人善待青蛙，它也会视人为朋友。如果当初能有照相机拍下这个难得的人蛙和谐镜头，那是多么珍贵啊！

星转斗移，一个甲子过去了，当年供我采菱的池塘、湖船早已不在了，然，那些四角尖尖的野菱，尤其那只青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，成为永远的记忆。

认清。老太太把手里的曲谱合上，让我放回柜子，叹口气跟我道出了原委。原来赵景深晚年深受帕金森病之苦，才会把字越写越小，越写越难看：“有回在他家里唱曲子，赵先生开心，来得要唱，可是手抖把谱子掉了在地上，我上去帮他捡起来，然后给他当了个书架子。”她说。

最近见到三封赵景深的毛笔信，分别写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信上的字竟然好看得不得了，既小且美。那时，赵景深正值中年，矮矮胖胖，戴副眼镜，一身富态，让人很难和这三页信上的字产生联系。我主观妄断这不合理，就像赵景深说自己不识茅盾前，觉得茅盾该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，否则写不出《幻灭》《动摇》《追求》如此伟大的三部曲，然而见了茅盾，以为认错了人，茅盾怎么比自己还矮、还小、还近视？但一切就是那么真实。

赵景深有位好朋友徐调孚，是商务印书馆的名编辑，他曾在给胡灵的信中谈到几位作家的字。在他眼里，“老舍的字端正朴厚”；茅盾的字“瘦削琐小，极像他人体”；“郑振铎的钢笔字原稿，固然乌里乌槽，人家见了喊头痛，但他的毛笔字，说句上海话，写得真崭呢”；沈从文“临摹草书，极有成就，他的毛笔字极现飞舞之姿”；俞平伯的楷书“有平原之刚，而复兼具钟繇之丽，精美绝伦”；朱自清的字“拘谨朴素，一如其人”；“叶绍钧楷书温润平正，深得率更三昧”；丰子恺的字“颇有北魏风度，只惜笔力犹欠遒劲”；乌鸦主义的曹聚仁的稿子，“只见一团墨黑，真像一只乌鸦！”而赵景深的字则是“摇曳多姿，似出闺秀之手”。老太太一定高兴我有福消受这份视觉的恩惠，笺上的墨痕活脱脱昆曲里的柳梦梅杜丽娘、潘必正陈妙常，典雅温婉。我想这与他热爱昆曲是有关联的，细笔游丝，宛如昆曲行腔若即若离。这字和他的文风又颇为相似，清丽婉约，浓浓的浪漫主义，可谓处处见风流。

赵景深这三封信都是写给张仲锐的。张仲锐即张次溪，字学家、方志学家，出版过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《李大钊传》《北京岭南文物志》（与叶恭绰合编）等书。1951年8月13日那封信里，赵景深问他的仲锐兄，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何时再版，他的序会赶得及奉上；也请张仲锐在《李大钊传》出版时一定要赠他一本读一读——凭着数十年出版人的直觉，赵

近代以来最为风行的琴谱，先有《琴学入门》，后有《梅庵琴谱》。究其受欢迎之缘由，它们都一改主流琴谱不注节拍的惯例，前者甚至还加了工尺，具有简明易学的特点。民国时期，《梅庵琴谱》的正式刊本仅一种，而《琴学入门》自同治六年（1867）以来，版本繁多，其中最为通行而常见者，为中华图书馆刊行的石印本。

然而，这一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并没有标记刊行时间，在版本著录、论文引述过程中，难免令人无所适从。可能是鉴于石印技术在光绪初期就已在上海出版业普遍使用，有学者视此本为清末刊本，如易存国，将之列于同治六年与十三年两种版本之间（《中国古琴艺术》第373页，人民音乐出版社，2003年11月），书贾则更是乐于将刊行时间上溯，为索求厚利多一分筹码，却忘了考察一下中华图书馆的由来。据《石头记：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 1843—1956》（苏州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12月）第285页，辛亥九月十三日（1911年11月3日）上海光复，不久成立民国第一图书公司，“未及一年”，公司迁武昌，叶九如等人遂在公司的河南路发行所原址集资创办中华图书馆。也就是说，中华图书馆之存在，早不过民国元年秋季。其实，仅从“中华”二字，也大抵可知此馆必创办于清室倾覆、民国肇始之后。中华民国、中华书局、中华图书馆……时代意识如此，可见一斑。

常州友人叶康宁先生，提供了他收藏的一册线装铅印本《中华图书馆书目》，第十八叶“戏曲类”中载有琴谱两部：

琴学入门（印刷中）
五知斋琴谱大成 二元

由是可知，当《书目》印出之时，《琴学入门》正在印刷中。

这本《书目》和《琴学入门》一样，竟然也没有标注印制时间，但“封二”关于“小说周刊《礼拜六》”的广告，却透露出了时间信息。其结尾是：

自中华民国三年六月六日发行至今，已达六十餘期，平均每期销数一万二千餘册，每册价一角，定购全年五十册者，只须四元。各大书坊均可购取。

景深认为“此书当比天桥更好销”。

另两封信的日期在解放前，内容以约稿为主。1948年9月1日那封上说：“仲锐同志：来书诵悉。弟在此编‘俗文学’，恳赐大稿，以光篇幅。蔡晋吾先生稿囑作序，当为写述。全书既仅一万数千字，请将稿前二类赐刊俗文学如何？后二类亦盼一并寄下。‘梨园世说’亦盼赐寄。均须挂号。否则仍照以前办法，由兄寄草稿与弟，再由弟读后作序寄上。因凭空作文，虽有目录，终嫌隔靴搔不着痒处也。来稿每篇文字数以不过六千字为合用。”据说赵景深做编辑约稿子很有一套，他编《青年界》有回跟老舍约稿子，信上大书一个“赵”字，用红笔圈了起来，旁边加注：“老赵被困，请发救兵（小说也）”。老舍回信：“元帅发来紧急令，内无粮草外无兵！小将提枪上了马，青年界上走一程。哎！马来！参见元帅。带来多少人马？两千来个字，还都是老弱残兵！后帐休息！得令！正是：旌旗明日月，杀气满山头！”两人一来一往，十分有趣，这封写给张仲锐的倒显得平实了。

1948年10月19日的信上说：“来书诵悉。拙序撰就奉寄。闲园佚稿遵嘱寄北平烂漫胡同四十九号。……”2013年我在北京念书，有空时就在北京的各个胡同闲逛。那天在北三条进了程砚秋故居，恰逢内部装修，狼藉一地。因是民居，门口没人阻拦，我在院子内随意走动，在一棵大树前被装修工拦了下来，差些被当作小偷赶了出去。之后这“烂漫胡同”也是在这样的乱逛中去走过一回的。

张仲锐出生在东莞，从小在北京长大。烂漫胡同曾经称为烂庙胡同，另有叫烂面胡同的。旧时会馆林立，这条胡同就有六座，自北往南，是济南会馆、湖南会馆、常熟会馆、湘江会馆、东莞会馆和汉中文馆。赵景深信中所说“烂漫胡同四十九号”是东莞会馆，张仲锐长居在此，直到病逝。如今这条古老的胡同虽名曰“烂漫”，名字好听，却毫无烂漫可言，随处一“拆”字写在破败不堪的砖墙上，珍重地等待着它的春风。

赵景深写这三封信的时候，仍然在北新书局当总编辑，住在林森中路四明里六号。林森中路即今天的淮海中路，四明里则早已拆除。1951年，赵景深辞去北新的职务，专心去复旦大学教书；1957年，赵景深与曲友们成立上海昆曲研习社，被众人推为社长。

中华图书馆石印本《琴学入门》的刊行时间

严晓星

民国四年八月上海棋盘街中华图书馆谨启

这个推广《礼拜六》的广告时间民国四年（1915）八月，应该是这份《书目》最明确也最接近的时间。石印本《琴学入门》，当在此后不久问世。从当时的石印技术成熟程度来看，应该不会延迟到次年。

中华图书馆这个石印本《琴学入门》，不仅是《琴学入门》的最后一个版本，也可能是存世量最大的一个版本，至今仍极为常见。它大概也是中华图书馆的“常销书”，民国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《礼拜六》杂志上，还有“精校重刊《琴学入门》”的广告。

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